

SANXINGDUI RESEARCH

三星堆研究

启功题

第四辑 · 采集卷



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 编著
主编 王居中 阙显凤 / 副主编 邱登成 朱亚蓉



巴蜀书社

三星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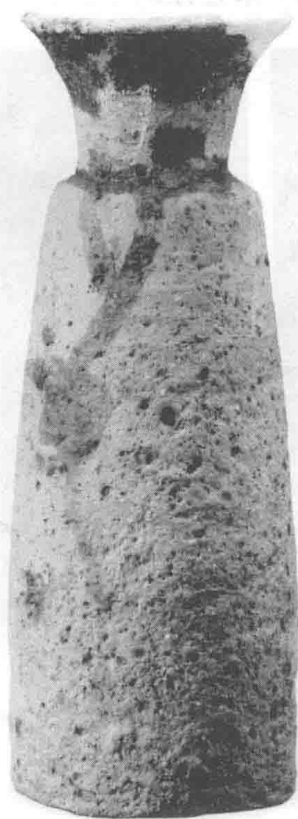
启功题



第四辑·采集卷



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 编著
主编 王居中 阙显凤 / 副主编 邱登成 朱亚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星堆研究 第4辑 / 肖先进, 王居中, 阙显凤著
--3版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4.11
ISBN 978-7-5531-0475-1

I. ①三… II. ①肖… ②王… ③阙 III. ①三星堆文
化—研究 IV. ①K872.7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9459号

三星堆研究 第四辑

SANXINGDUIYANJIU

主编 王居中 阙显凤 副主编 邱登成 朱亚蓉

责任编辑 童际鹏

封面题字 启 功

出版发行 巴蜀书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发行科(028)86259422 86259423

电 话 总编室(028)86259397

编辑部(028)86259411

邮 编 610031

网 址 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285mm

印 张 13.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1-0475-1

定 价 90.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调换

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三星堆研究》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学勤 李伯谦 张 柏 苏东海 吴加安 徐荣旋
黄景略 谢辰生 童明康

主 编：王居中 阙显凤

副 主 编：邱登成 朱亚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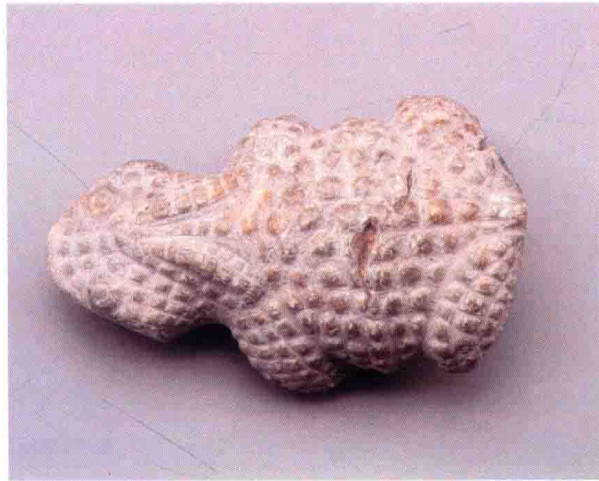
编 辑：吴维羲 余 健 董 静 乔 钢 朱丹丹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居中 王 毅 马继贤 邓 聪 邓淑苹 孙 华
刘 弘 江章华 许 杰 肖先进 张跃辉 宋治民
何 靖 李复华 李昭和 陈显丹 陈德安 沈 辰
林 向 邱登成 段 渝 赵殿增 敖天照 高大伦
阙显凤 谭继和 樊 一 霍 巍 鹤间和幸
魏学锋



小玉璋



玉蟾蜍



陶鸟头勺把



玉琮



玉凿



双耳罐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采集文物



小铜人



玉蟾蜍



籽玉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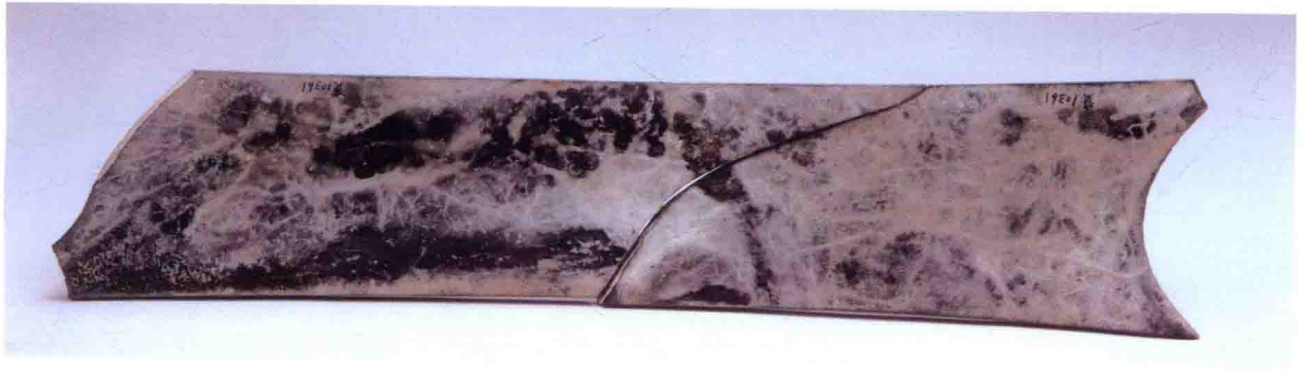
石矛



铜虎



猪头勺把



玉璋



玉料



玉斧



玉凿



石铈



玉琮

1931-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入藏的广汉月亮湾出土文物



玉璋



玉铉



玉瑗



石璧



玉琮



石矛

四川博物院藏广汉出土三星堆文化玉石器

总 序

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研究院策划编撰的《三星堆研究》丛书，现已开始出版。这套丛书首先把已有的田野考古简报、报告和研究论作搜集编辑起来，堪称过去工作的综合总结，同时还要面向国内外，继续收录，以推进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化探索的发展。这是一定会受到学术界欢迎的大好事，主编单位嘱我为丛书写几句话，自然是不容推辞的。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篇章。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华夏隔绝不通。尽管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还有佚文存留，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设专篇记述，但由于其间多杂以神话传说，被不少学者斥为不可凭信，四川古史成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

遗址究竟是在哪一年第一次发现的，也就是说当地农民燕道诚偶然在月亮湾（今真武村）挖到玉石器的时间，自来有1929年和1931年两说。

1934年到遗址进行发掘的华西协和大学美国学者葛维汉在《汉州发掘简报》中引用董笃宜的记录说：“1931年春，我听到当地群众议论：离该地不远，发掘出石刀和石璧。”^[1] 1949年考古学家郑德坤先生的《四川太平场文化》一文也说：“1931年春，四川汉州太平场的燕先生为其田地装设水车，偶然发现地下一坑石璧和若干

[1] 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第176页，巴蜀书社，2004年。

玉器。”^②

1979年冯汉骥、童恩正两先生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则说：“1929年，该地中兴乡的农民燕某曾在他的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③

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对，或许无法确证，无论如何，遗址的发现是在中国考古学发现不久的阶段，距今已七十多年了。

《汉州发掘简报》估计遗存年代的“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并指出其文化性质“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这种观点实际是来自那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

葛维汉的发掘结束不久，闻讯之后的郭沫若先生向其致函索取有关资料。1934年7月，郭沫若在给华西协科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的信中说：“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工艺品，如方玉、玉璧、玉刀等，一般与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出土器物极相似。这就证明，西蜀（四川）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在殷代甲骨文所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周王作战。此外，在广汉发现的各种陶器是极古老的器型，你们判断为周代早期的文物，也许是可靠的。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这段话所包含的预见，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完全实现了。

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省的考古学者在这处遗址做了大量调查发掘的工作，逐步弄清了遗址的构成和文化的性质，成果是明显的，但还没有引起专业以外人士的注意。直至1986年，遗址内三星堆两座器物坑被发现，一鸣惊人，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目光，就连没有接触过古蜀历史的公众，也都知道三星堆的大名。

其实三星堆这个词，在《汉州发掘简报》里已经出现。简报记述说：“燕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似一轮

[1] Cheng Te-k'un, Stud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p54,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1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太平场、中兴乡都是三星堆遗址所在地。

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①哪里想到在土墩中埋藏着如此丰富奇异的珍宝，以致整个遗址最后定名为三星堆遗址，连其所属文化也被称为三星堆文化了。

翻读《三星堆研究》辑录的种种报告和论文，我们应该感谢在这方面辛勤工作、奋力开拓的所有考古学家与有关学科的专家。是他们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的奥秘，使大家重新看到湮没已三千年的古蜀文化的灿烂辉煌。

我曾说过，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足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比。在海因里希·施里曼发掘之前，特洛伊只是荷马史诗中的神话；在保罗·博塔发掘之前，尼尼微也仅见于基督教《圣经》。《华阳国志》的《蜀志》明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之误），封其支庶子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些话过去人们大都不相信，甚至以为荒诞谬误，在三星堆发掘以后，才认识到其中确实有着王国维先生说的史实之素地。

因此，我们回顾三星堆遗址发现与研究的历程，不妨考虑一下两个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正确对待富有神话色彩的古史传说。如果由于传说与神话混杂，便予以抹杀否认，就很难重建古史了。这个问题，蒙文通先生、徐炳旭先生都有深入的分析，近来讨论的也比较多。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适当使用时代较晚的文献材料。《华阳国志》成书晚至东晋，然而内中保存的传说，却是远有所本。这一点应该对我们于方法的层面上有其启示，但仍较少为人注意到。

如果说1929或1931年燕道诚的发现和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的发掘，只是偶然叩击了古蜀文化的门扉的话，经过近五十多年的工作和研究，特别是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以及成都金沙等等新的发现

[1] 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第176页，巴蜀书社，2004年。三星堆发掘以后，才认识到其中确实有着王国维先生说的史实之素地。

之后，古蜀文化的大门已经是洞开了。不难预计，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一定会在三星堆和其他地点有更多更重要的新发现，促使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的这套《三星堆研究》丛书，也将会连续出版，而且越编越好。

李学勤

2005年11月24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目 录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采集文物

壹、玉石器

一、玉石礼器 有璧、瑗、圭、璋等112件	(2)
二、玉石工具	(25)
三、玉石块料4件	(54)
四、玉石雕刻4件	(55)

贰、陶器

一、小平底罐	(57)
二、高领罐5件	(63)
三、翻领罐4件	(64)
四、深腹罐1件	(65)
五、双耳罐1件	(65)
六、大罐残件3件	(66)
七、高柄豆，残件64件	(66)
八、圈足豆8件	(77)
九、豆形器2件	(79)
十、陶勺29件	(79)
十一、陶盘7件	(84)
十二、陶盂10件分2型	(85)
十三、带流器1件	(88)
十四、陶瓶3件	(88)
十五、陶壶6件	(89)
十六、陶簋2件	(90)
十七、陶盆9件	(90)
十八、陶缸6件	(92)
十九、陶瓮13件	(93)
二十、尊形器2件	(95)

二十一、陶纺轮11件，分4型	(95)
二十二、陶饼1件	(97)
二十三、陶盖、纽18件	(97)
二十四、器座2件	(101)
二十五、支架1件	(101)
二十六、平底器3件	(101)
二十七、陶杯3件，分2型	(102)
二十八、陶圜锅1件	(102)
二十九、宽沿器1件	(102)
三十、陶柄1件	(103)
三十一、狗头柄1件	(103)
三十二、纹饰陶片4件	(104)
结束语	(105)
后 记	(108)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广汉市文物管理所采集文物

一、广汉遗存1929年的出土文物	(110)
二、五十年代采集的部分石器	(113)
三、七八十年代以来田间地头的出土文物	(117)
四、鸭子河中采集的玉、石、铜器	(155)
结束语	(159)
后 记	(161)
插图索引	(162)
图版索引	(165)
插图索引	(170)
三星堆遗址出土部分采集文物一览表	(177)

1931~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入藏的广汉月亮湾出土遗物

一、月亮湾首次考古发掘的缘起与经过	(179)
二、出土遗物	(180)
三、有关月亮湾遗存的早期研究与再认识	(192)

四川博物院藏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补记

一、入藏的背景和藏品的来源	(194)
二、整理发表的必要性	(196)
三、入藏品介绍	(197)
四、相关问题	(202)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采集文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随着广汉县办“五小工业”的兴起，各乡镇大办砖瓦厂、就地取土生产砖瓦的活动普遍展开。1975年，中兴公社（今南兴镇）利用“三星堆”高地，兴办了第二机制砖瓦厂。在“三星堆”取土中，发现非常丰富的文化层，出土了不少陶器碎片及石器。县文物部门去现场调查，上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省考古队原计划1978年开始在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因全省考古工地繁忙，迟至1980年5月起，配合砖厂取土，由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县文化馆联合在“三星堆”试掘后，接着又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1982年，结合三星堆砖厂在附近台地取土又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1975年，三星堆遗址范围内的真武村，利用陈家梁子（东城墙）及月亮湾台地，也兴办了机制砖瓦厂。考古队于1984年又在真武村文化层较丰富的西泉坎进行考古发掘。至1986年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师生也前来参加联合发掘。7~8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以后，停办了三星、真武村两处砖厂，继后在三星堆砖厂所在地，建立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主持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至今先后进行考古发掘10多次，至2014年已发掘面积10000多平方米，出土了珍贵的房址遗迹和各类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数千件，各种陶器碎片数十万件。

在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省县联合考古队及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相继在遗址范围内采集了不少三星堆文化遗物。2005年秋，结合清理三星堆遗址采集文物工作，清理出各类石器、玉器、陶器残片400多件，其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古队和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在进行考古调查，了解三星堆文物分布点和三星堆古城范围中，采集的出土文物；二是在考古发掘的各工地附近采集的文物；三是三星、真武砖厂在三星堆遗址取土中采集的石器、陶器残件等；四是遗址区内，群众在进行田间生产，农房建设中，发现石器、陶器及较有特征的器物残件，向考古队、遗址工作站上交的出土文物。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近期在真武村征集有燕开忠、燕开正、曾修廷等社员在田间地边采集少量的石器、玉器等。

这些采集文物中，初步统计有各类玉石器234件，陶器及残件257件。其中，玉石器如璧、瑗、圭、璋等礼器112件，约占采集玉石器的47.8%，大小石璧残件居多，玉璋中，射端斜出一尖角的凹弧刃璋比较珍贵。玉石工具中，又以斧、镑最多，石凿、纺轮次之，扁平尖状器另一端有双面刃似斧的两用器少见，石雕人像、石虎及石雕鹰蛇器最为珍贵，暂定名为椎形器的一对长条扁形残石器尚待考究。

采集的陶器中，完整的或经修复复原的陶器18件，其余均系各类陶器口沿、底部或具有其它特征性的标本，圈足豆的圈足，有高有矮，高的达17.5厘米，矮的只有6厘米。从修复复原的1件圈足内有

烟炱痕迹看，圈足豆也可能是炊、食两用器，圈足上的较多而大的镂孔，不单是装饰纹，可能就是底部火苗的通风口；从采集的高圈足和大豆柄内部有较粗的螺旋纹观察，三星堆遗址的陶器中，除有原始的手工捏塑的陶器外，也还有泥条盘作和泥条叠作的制陶工艺，陶盖的盖纽中，有的纽中有孔，或纽侧镂孔作为蒸气出口的器盖也不多见。有的口沿经同心圆图测量、绘图后，可以分型分式。总体情况是手制和慢轮制作的各类陶罐居多，高柄豆、鸟头柄勺次之。现将已清理出的三星堆遗址工作站采集文物，按照器物质地、形制特征分述如下：

壹、玉石器

按质坚、细腻、润泽的美石区分，也有少量玉器，多数属石器残件。

一、玉石礼器 有璧、瑗、圭、璋等112件

大小石璧残件及璧芯坯料98件，约占玉石礼器的87.7%，占采集玉石器近二分之一，与广汉市文管所采集的石璧一样，占整个玉石礼器的极大比例。有的残存壁肉一小段，有的残存半块，好孔多数为一面管钻，少数双面管钻。有的好孔未钻穿，还是半成品，或是在制作过程中因破损而废弃；有的还是石璧坯料。

1. 残石璧。58件

从这些残件考察，石材有厚有薄，并不规整，大小因材琢制，很不统一，其形制大体可分三型。

A型35件，壁肉中部厚、周边薄。多数壁肉两面斜磨平整，近好孔的壁肉较厚，周边较薄，也有周边厚薄不匀，有的利用砸击剥裂较大块的石片，稍加打磨还有凹凸不平的疤痕，有的周边不是慢轮磨制，是琢制而成的，好孔均为一面管钻。由于管钻好孔壁多为斜面，进口大底口小，形成两面孔径不同、壁肉宽度各异。按不同型制的大小石璧，又可分三亚型：

Aa型13件，外缘直。即壁肉两面打磨平整，周边外缘磨制平直，圆轮棱角明显。

采编号159灰色板岩，残存壁肉一段长11.7厘米，两面斜磨平整，中部厚周边薄，近外缘有疤痕，外缘直，好孔壁有管钻细螺旋纹。壁肉两面宽5.6~6厘米、内外厚1~1.3厘米、外径19厘米（线图一，1；图版一，1）。

采编号173，深灰色板岩，残存壁肉一段，长10.2厘米，通体磨制，两面有局部疤痕，中部厚，周边薄，外缘直，好孔壁有管钻细螺旋纹。壁肉宽3.7~4.1厘米、厚1.1~1.4厘米、外径12.2厘米（线图一，2；图版一，2）。

采编号185，灰色石质，残存壁肉一小段，长7.9厘米，两面磨平，中部厚，周边略薄，外缘直，圆轮规整，好孔壁有单面管钻螺旋纹。肉宽3.5~3.8厘米、厚1~1.3厘米、外径16厘米（线图一，3；